

纪 事



一个工人的求知故事

不管怎么撇清，在我这个“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种种奇怪的故事。上帝不让我用正常手段获得知识，我只能“非法成长”了。《光明日报》邀我撰文谈谈自己的求知经历，我只好借机再向亲爱的读者坦白一些自己的糗事。

我的父亲不到三十岁就去世了，身后背了一屁股债，于是全家四处逃亡避债。我那年四岁，起初逃到宁波，后来潜回上海。在上海，住在一个棚户里。住了几年，要上学了。折腾了一阵，我祖母想出一个办法：让我改名换姓，作为上海工部局职工的子弟，设法进有名的工部局北区小学。我本名“沈锦文”，现在改为“王昌文”，作为时任工部局职工的我们的亲戚王某人的孩子，免费入学。于是我从小就用假名生活、上学，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快毕业时，学校知道真相，找我谈话。我很紧张，以为会被开除。不料校长葛鲤庭说，只要改回本名就行了。真想不到，校方会如此善待我。

好事还在后头。将毕业前几天，校长对我说，你如果能考取工部局办的中学，可以给你一笔奖学金，免费入学。原来工部局教育系统的元老沈恩孚先生八十寿辰，有一笔礼金，捐助为奖学金。我后来考取了工部局育才中学，就用“沈昌文”的大名作为免费生入学。

但是，到了初中二年级开学不久，校方说奖学金用完了，要我自己支付学费。我这时已经学会做上海的“小滑头”，满口称是，其实下周就溜之大吉了。

1945年3月，我开始做上海银楼（金银首饰店）的学徒。我开始学习制作首饰技艺，但我不甘心放弃读书求知。起初进补习学校，学过会计、英语、速记、电信，但学费不少，花不起。后来听说，首饰店不

远的法国公园里清早有人免费教书。我早起来一看，不得了，好多人在那里讲课。特别是，育才中学的英语老师丁文彪和一位教语文的赵老师都在。这里不需要报名、缴费，你到时候坐下听课就是。丁老师讲英语的《泰西五十轶事》，赵老师讲《古文观止》。于是我每天一大清早就去耐心听讲，回到首饰店站在柜台边认真默诵。丁老师在英国牛津大学留过学，在育才中学很有名，我们都叫他 Doctor Ting，不知为什么他要一大清早到公园里去免费授课。说来不信，这两位老师让我好好地打了文科基础，毕生受用。20世纪80年代我同汪道涵老同志时有接触，说起外国古典文学，我漫不经心地背了几句《泰西五十轶事》中的英语，他大为惊异。

1947至1948年光景，上海大乱，黄金不准买卖，首饰店停业了，不少店员被解职。我算侥幸，留在店里做 boy，但是留职停薪，没有任何收入。这机会来得正好，我更有时间读书求知了。没有收入怎么办？不怕。我前些时候在夜校学过会计，现在派上用场：给人做假账，所得收入付现在的补习班学费足足有余。

不久又有了新情况：店主家乡（宁波镇海）经常来些人，找朋呼友，在店里打牌、饮宴。后来知道，他们其实来自苏北，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来上海采购物资、联络人员。为首的一位叫虞天石，他干脆就在首饰店旁边租房住下。虞天石对古典文学很有修养，常常指点我读唐诗。过些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年轻病人，要住在首饰店里。现在店里只有我这小 boy，就只能把我的床给他，我睡地铺。他叫李佺民。时间长了，才知道他是富家子弟，去苏北参加革命，现在得病来上海。他病好后不再去苏北，要在上海读大学。店主让我为他办理一切上大学的手续，交付各种费用。办完手续，送走了李佺民，我真想大哭一场：我自己怎么上不起大学呢？！

李佺民上大学后还常来首饰店玩。他见我读英语很勤，忽然说：你干吗不学俄语？将来俄语用处可大了。这话启发了我。我这小上海当然很会投机，不过我们那时对国民党统治也实在不满，又天天同那些地下共产党在一起，他们对我这个“小瘪三”真好。我知道，那时上海霞

飞路一带有白俄人教俄语，于是马上报了名。那些白俄老师我也很喜欢。后来知道，他们其实都是苏联的大知识分子。其中一位夏青云老师，俄文原名：别列列勋，是位诗人。从此我就刻苦学俄语了。记得单单为了学会发卷舌音 P，我就在做各种体力劳动的同时足足奋斗了一个来星期。

1949 年以后，又进了夜大学，学新闻。1950 年三联书店招收工作人员，我满怀热情地去投考。我想这么一个革命单位，肯定会欢迎我这个自学的工人去投考，于是把上面的故事大概齐地向他们说了一通。不料店方答复说，我们要招收大学生，不招收工人。

这场不成，我学乖了。过一年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伪造了种种证件，证明我是个正规大学生、年轻知识分子，于是考取，成为新中国的革命出版工作者。

1953 年，“忠诚老实”运动中，我的一切伪装伎俩以及做假账等违法行为都被揭发，人事科长要把我这个坏蛋遣返上海，辞退了事。可是，就在那时，我从俄语翻译的作品陆续出版了。当年的出版社领导人看了所有这一切，悍然决定：把沈昌文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工资从三十三元提为九十九元，级别从办事员提为副科长，今后调任社领导专职秘书。

这是我上小学以来用种种不合法手段求知得到的最好结果。

直到现在，我对自己使用过的种种不合正规的求知手段并不后悔，因为舍此别无他途。我只是万分怀念丁文彪博士这样的贤达。现在的牛津博士中间还有这样的君子吗？

2014 年 5 月

出版学徒生涯纪程

我在最近一些文章中戏称，现今中国大陆存活的出版人，大抵可分三类：老的一代，可以称作“革命型”。他们大多是因投身革命而搞出版，或者是因搞出版而投身革命。他们谈起出版，总有强烈的使命感，大多可以说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献身业绩。最新的一代，可以称为“学者型”。他们多半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科学士、硕士、博士……，说起出版来，自然要同我辈觉得费解难明的“语言霸权”“耗散结构”“集体无意识”“词义向心”之类语词挂钩，使人肃然起敬。中间的一类人，既可挂在前边，说自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某个岁月就已“投身革命”；也可挂在后边，说自己总算赶上了某个“后……主义”。不过认真说来，若非你今天瞧上去两鬓斑白，人们出于礼貌，语词上稍有尊崇，其实是两边都不会认你。我于是干脆把他们另列一类，称这些人为“学徒型”出版人。

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学徒型”出版人。

所谓“典型”，不只是因为年份关系。我1951年“投身革命”，也就是到出版这行业中来，可说是此型中较早的一人。也不只是职务关系。我从校对员干起，最后当上一社之“长”，诚如“文革”中人们对我的“老底”的“揭发”，所谓“因缘时会”因而“跻身上层”。更主要的，我确实是“正科”学徒出身。十三岁就弃学就业，拜师学艺（不是象征性的说法，而是确确实实在一块红毡条上磕三个响头拜师），如是在社会底层讨生活六年。那时学的不是出版，但倒由此认识好些新派和老派的出版人，同我以后有条件时考进出版社当校对员不无关系。这是我一生中学徒的第一次。

十九岁到四十九岁，1951年到1980年，足足在一家出版社干了三

十年，大多时间是给领导当秘书。这可以说是我当学徒的第二次。那时的出版，无所谓“策划”“营销”……，成天嚷嚷和兢兢业业学习和实行的，总的说是“认真”两字。天天费力在认真消灭错字，认真规范写法，认真统一译名，以及认真地把一本书里面文件或经典中没有过的说法消除掉。我有幸的是给五六位有学问的领导当秘书，于是可以天天听到看到他们除了认真消灭错字以外在别的方面怎样的“认真”，比如说，怎样认真执行“双百”，怎样认真地动员老作家“翻箱倒箧”，把旧作整理出版，尤其是，怎样认真地了解和阅读、研究国外学术信息。看起来，他们在后面这些事上的认真并不符合“认真做好出版工作”的要求。所以，到了1959年，其中的一些位挨整了，1966年，几乎全都挨整了。我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他们的“小爬虫”，幸免于大难，但也由此着实学了不少乖。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1959年怎样同一位女友一起去参加对一位老领导的批斗会。会后，我同这位女友看法歧异，我显然是被这场面吓破了胆，竭力证明这么批斗的合理性，于是，我们终于分手。要说揭发我如何“因缘时会”，由是“平步青云”，其实这位女友最有资格，可惜的是，她因长年抑郁，早已不在人世了。

经过这三十年的出版学徒生涯，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在认真做好出版的各项细枝末节上，在认真执行出版纪律上，的确是做到了前无古人，也恐怕是后无来者。我感谢这三十年可以说是正规的学徒训练。说它是“学徒训练”，在一个意义上并不为过，因为它注重的主要是技艺和服从这两项，同我此前六年里师傅训练我的东西，精神上并无很大歧异。但是就我个人说，还要感谢前一阶段六年学徒生涯中师傅给我的上夜校的特许和自由，让我居然混到中学、大学学历，从而得以混迹于知识层中。更要感谢在第二阶段三十年的学徒生涯里，我所侍奉的各位领导的言传身教，让我知道在认真消灭错字以外，还要认真地“睁眼看世界”，要认真了解外国和古人，因此也有了认真掌握外语工具的意向。现在想起来真是奇怪，当我学德语的时候，同学即是当时的首长。白天我管这位领导的用车、出行，开会为他做记录，晚上他同我一起背诵 *Immensee*，他还老要我帮他纠正发音。

这样，到1980年起，当我开始第三次学徒生涯时，一方面觉得种种突兀和惊讶，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已有不少准备，不免暗自高兴起来。

说来惭愧，我是以快五十岁的年龄，在1980年3月，才开始真正地做起出版学徒来，算是进了出版这一行业。此前种种，自然不能过分轻薄，斥为枉度，但怕也只能说是真正进这行业以前的准备。

我在这时开始编《读书》杂志。这个杂志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让我了解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化人，什么是我们的文化前景，我们这些出版人的职分何在。这次学徒，学了整十五年。现在可以说，从出版人的角度看，有了这十五年，此生才不算虚过。

《读书》创办于1979年4月，等我进去，已经办了将近一年，业绩已经非常辉煌。创刊时一篇《读书无禁区》，振聋发聩。接着又一篇《国必须四门大开》，作者是我的一位前领导，1959年挨整以后雄风依然。我以后要做的事，已经不是“创业”，而只是“曹随”罢了。事实上，十五年里，我之所为，也仅止于此。

十五年里，我看到的出版人风格，同这以前迥然不同——尽管人往往还是这些人。他们的主要一条，就是把出版这行业看成是传播真理，而不是只此一家，限制传播。我亲眼目睹这些当年的革命的老近卫军，怎样拍案而起，怎样据理力争，怎样字斟句酌，怎样夙宵匪懈……他们不是党内异端，而应当说是更忠实的共产党人。当杂志产生风波时，一位老人对我说，我们要相信党中央，相信十一届三中全会，相信十二大、十三大……，至于某个部门领导的什么什么说法，你就要自己鉴别了。由此，我常在编辑部内提倡，“相信中央，尊重领导”。对领导，自然要尊重，但不能领导的话句句必信，而要根据中央精神分析鉴别。这是我在《读书》学到的第一招。

一次，一位极其负责的领导派人送来一文，批判某位教授写的咏事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版社内一位负责人批示必须发表。编辑部吓坏了。反复讨论，一位党的老近卫兵斩钉截铁地说，《读书》欢迎发表不同意见，但是绝不可打棍子。你们要打棍子，我就退出《读书》。于是退稿。由是，我们明白了“争鸣”同“棍子”的区别，让我这个学徒

又学到了一门新的学问。

说到这里，我不得提到一位老同志——史枚同志。这位老人在1957年后即已沉寂，人们不大知道他。《读书》创办时，他任执行副主编。后来，他因某项原则问题同一位极其负责的领导有争论。按组织程序，他当然被认定为犯了错误，并且开会作了结论。那天下午，他同我说了几句对上面提到的某位负责人的情绪很低沉的不满的话，照例挟了一大包稿件徒步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消息传来，老史当晚脑溢血发作，等我赶到医院，已经人事不省。史枚同志虽有“老右派”之称，其实我了解他是对党的出版事业极其负责的有正义感的人。在干校时，我们一起劳动。虽然备极辛劳，他工余必然要站读马列著作个把小时（很奇怪，他读书时一定要肃然起立，不像我那样欢喜提倡“卧读”）。我第二次当学徒时，1951年，他已是编辑部主任，同我的贵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以后他成“右派”，我们不通音闻更有如许年。但在《读书》共事几年，特别是他临终的那件事，给我极深的刺激。我知道作为一个出版人，要传播真理，有时还得“死谏”。

办《读书》，全靠一批读书人支持。联络这些读书人，不是易事。按我在20世纪50年代所受教育，这当是出版人天经地义该做之事。当时我们领导提出过“以文会友”的口号，在整个出版社中，提倡经常访问作者。1954年，在一位领导倡议下，开了十一次作者座谈会，我参与去吃了十一顿饭，算是盛举。当时访问作者最成功的，是一位张梁木先生，每次访问后必写有专篇访问记送领导，其中分析文化形势，提出写作可能，绘声绘色，煞是精彩。可惜，1957年此公远戍北大荒，从此什么“以文会友”之类口号顿绝。20世纪60年代，有领导将我联络一些译者，按月付给生活费，实际上还是为上面的“反修小组”干活。“文革”一来，这变成“投降纳叛”，成为本人一宗不小的罪名。在这情况下，又说要联络读书人，自然心理负担极大。但是，在《读书》杂志一些老领导人带领下，毕竟是打开局面了。杂志创办之初，陈翰伯、陈原、冯亦代带领编辑，去全国若干主要城市。钱钟书、金克木等著名文化人，便首先是他们这些老辈联络来的。

我与三联书店的三段因缘

我的出版生涯，同三联书店密切相关。打从十五六岁起，生活书店（三联书店的前身）就是我的偶像、我的憧憬。但是，尽管我千追百求，当年我无缘成为它的员工，进不了它的大门。几十年后，我行年五十有余了，因缘时会，我忽然成了北京三联书店的第一把手——总经理。这里说说其中的故事，也趁便谈谈三联书店近几十年来的变迁史。

小“仆欧”眼中崇高无比的三联书店

我1945年十四岁光景就失学进银楼当学徒工。才一年多，中国的大局势有了变化。1947年前后，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不久禁止黄金买卖。于是银楼就关门了，店员都遣散了。在这种情况下，老板考虑到以后可能还有复业的希望，就把我留下。我没正经事，只伺候老板和他的朋友们天天饮宴和打牌，成为了一个十十足的上海滩的小“仆欧”（boy）了。

我没有工资，一无收入，直到1951年3月。现在来看，有这几年经历倒也好。第一，我趁伺候人的机会认识了一些人，特别是进步的文化人，以及当年的生活书店员工，这关系到我今后的发展。第二，我有了时间上夜校，做一个半吊子的学生，为解放后进入文化界创造了条件。这两点，使我成为现在的沈昌文。

老板的表弟贺尚华，是生活书店出身的。来上海后，自己在上海四马路开了一家“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没开的时候，邮件都托我这小鬼收转。我经常收到解放区寄来的书报，大开眼界。有一次，读到寄来的《李有才板话》，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中国红色文学。贺先生自

己的店开业后，我也常去。

贺先生曾经带来不少朋友，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黄宝珣女士。这位女士也是生活书店出身的，那时在上海经营一家耕耘出版社。他们常在饭桌上谈论业务，以及生活书店的往事。黄女士谈锋颇健，常常让我旁听得入迷。她的先生，一个四川人，食物非辣不能下咽。这就苦了我这仆欧——他一来，就要我上街去买什么“鱼香肉丝”。这也是让我难忘的。

老板让我伺候的人各种各样，就政治身份说，有国民党、青年党，更有大量的共产党。后来我发觉来的人中间，共产党越来越多。宁波有一个地方叫四明山，据说新四军被打散的时候有一个“三五支队”退到这个地方，所以以后宁波人就称共产党为“三五”。老板有个堂兄叫赵鸣皋，据说就是“三五”。他就住在这家银楼里，常常同我们谈时局，对我们很有启发。他也常要我读生活书店的书刊。真也凑巧，那时的生活书店就在离我做工的商店不远，吕班路上。于是我常去浏览。那里有卖好看的书，我最喜欢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对其中沈起予先生写的《怎样阅读文艺作品》特别入迷。后来据说，沈起予就是夏衍。

在我自学的长途上，对我帮助极大的还有一位是店主的弟弟赵振尧先生。他1946年前后自大后方来上海，看我喜欢书本，常勉励我。一次，他把当年我接触到的第一本新文学方面的书借我看。那是骆宾基写的《萧红小传》。我由此才知道新文学，想起初中一年级时语文老师陈汝惠先生提到过的一些人。后来，振尧先生为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编校一本讲希腊神话的书，要我做些抄抄写写之类下手的事情，由此我才知道什么是编辑出版工作，并且喜欢上了它。

还可以讲一下我同著名的台湾女作家於梨华的结识。老板的一个同乡叫於升峰，留法的化学家，1946年从大后方到上海，要转道去台北，借住在老板店里。於先生的大小姐梨华小姐跟保姆说要找书看。他们说我们这店里没有书，只有楼下的小屋子里边有个小鬼他还有一点书。大小姐屈尊专门来找我。我记得借给她看的是生活书店的《世界文库》。那是我从废物堆里捡来的，不知是哪位贵宾留下的，自己正在愁看不

懂。我把我所有的品位最高的书借给她，於小姐见到这书，一定以为我是有学问的人了。

在这样的氛围下，到上海解放前后，我就自居为“文学青年”，开始不多看流行的小报，而读《文汇报》和《观察》，至多看看《东南日报》。也买了《生活日记》，喜欢得要命，很想写些什么。

从《生活日记》和生活书店别的一些书刊上知道他们在香港办了一个持恒函授学校。据介绍，那里的老师都是我素所仰慕的民主人士，如孙起孟、葛琴、邵荃麟、胡绳等。我非常想进去。不过当时我在学无线电收发报和俄语，钱都交了学费，再也凑不出钱，于是报了名没有去汇交学费，无法入学。

1949年刚解放不久，听说三联书店（生活书店的新名称）在招收员工。我满怀热情，写信去报考。那时以为，像三联书店这样的进步单位，一定会欢迎我这个“自学成材”的工人。于是在报考的信中把自己的“自学”经历和打工生涯刻意描述了一番，又把我对同生活书店的憧憬大大张扬了一下。我以为，三联书店一定会欢迎我。不料三联书店给我一个回信，说是本店需要的是大学生，不需要工人。我于是满头灰气，只得另筹出路。当然，三联书店那时投考要求上是说得很清楚，要招的是大学生，一切是我自作多情。

但不论如何，我同三联书店的因缘，从20世纪40年代中结下，但到20世纪50年代初又断了。

“名存实亡”的三联书店给我的启蒙教育

1951年3月，我吸取经验，不再张扬自己是工人，弄了一个大学生的身份考进了人民出版社（北京），当校对员。从此，我以为自己同三联书店无缘了。但事情真凑巧，就在那一年，三联书店合并到人民出版社来了。

这种合并，明显的是学习了苏联出版工作的“先进经验”。我不知道那时领导层对此有没有不同意见。就我在下面看到的，几乎是一片赞

同声。这样，三联书店名义上成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实际上是不存在了。我本人那时正在积极贩卖苏联经验，以此作为“向上爬”的本钱，自然对此一无异议。

合并以后，对我来说，一个最主要的好处是，我可以常常去原来属于三联书店的韬奋图书馆看俄文书。那里俄文书真不少，还有许多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书，据说都是苏联人赠送的。我后来找了一两本谈出版的，学习翻译过来。这使我不久以后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个图书馆后来销声匿迹了。我现在恰好住在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三联书店旧址上这个图书馆的楼上，经常念及三联书店这一往事，不胜感慨。

三联书店真的就消失了？不。没有多久，情况忽有变化。1954年中，人民出版社收到一个中央文件，名：《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决定》。我借当时担任秘书工作之便，至今还保存了一份上述文件复印件。全引太繁，扼要说些。

首先，文件批评当时出版社的工作“没有长期的打算，没有远大的眼光，表现了相当程度的盲目性。其次是，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外，没有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比较重要的理论著作，本国作家的学术著作所出无几……著作稿件的缺乏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出版社对组织作家写稿不够积极和热心是重要原因之一。出版社在作家稿件的处理上的积压拖延的现象及书籍的出版时间过长，也引起作家的不满，因而影响了写稿的积极性。”

接着，这文件特别强调三联书店的重要性。它说：“为使人民出版社集中力量做好上述工作并提高工作质量，应在人民出版社内部设立三联书店编辑部（目前三联书店并无单独的编辑机构，也没有独立的编辑计划），编制上仍为人民出版社的一部分，但须有独立的编辑方针与计划，以充分发挥现有译著力量。”

“三联书店应当更多出版著作书籍，以便使党员和非党员作者的各种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的用处的作品都能印出来。”“许多旧的学者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各方面材料的整理和考据的著

作，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这类著作……可酌量选印。”

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马上在人民出版社内设立了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这样，我这个当年进不了三联书店的人，又同“三联”发生关系了。自然，我不是三联编辑部的成员。但因为这是根据上面的意思成立的，单位里特重视，我作为社领导的秘书（那时已从校对员爬升到社领导的秘书了），也就经常去走动。何况陈原在这编辑部的兼主任，我当时就坐在他的对面。他是我专门伺候的对象之一。

三联编辑部一成立，人民出版社就热闹了，各种编辑活动轰轰烈烈展开了。

那时上面（据说是胡乔木）提出，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过去我们习惯编辑领导作者，现在要反过来。根据“开门办社”和“衣食父母”论的精神，人民出版社以三联书店名义做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创举。例如，社内举行了几次大讨论，公然辩论某部书稿的取舍。记得一个是关于《美国侵华史》的讨论。已经有一位党内权威专家刘大年先生写了一本《美国侵华史》，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当时是抗美援朝之后，这书当然是大热门。一位权威写过以后，别人能不能再写？按过去惯例是不大行的。恰好有一位卿汝楫先生，燕京大学的老教授，党外人士，又写了一本《美国侵华史》，很多说法和刘著不同。当时曾彦修先生主张三联书店一定要出卿著。激烈争辩多次，终于出版。我做多次讨论的记录员，大开眼界，由是知道我们在用苏联以外的办法做出版。（后来我知道，卿先生同汉奸胡兰成有很多关系。假如革命群众早知此事，曾老在1957年肯定又多一罪状了。）

20世纪50年代初的出版社是不必出去组织稿件的，所以在三联编辑部成立以前，出版社根本没有什么组稿活动。1954年上述文件下达之后，在本市，用三联书店等名义一口气开了十一场座谈会，会后都有饮宴。（我很自豪地说一句：这些饮宴都是我具体参与安排的。）在外地，陆续出去六七个组稿团，都由主要领导带队。组稿团的任务，明确是要出去“翻箱倒柜”，组织到高质量的书稿。这一来，当然组织到不少稿件。例如西北大学教授陈登原教授的《国史旧闻》，就是陈原去组

稿的。这稿子来了之后，我记得很清楚，陈先生在序里面最后一句话说：“稿成，有书贾来，乃付之去。”我看了大吃一惊。怎么能把党的领导陈原叫“书贾”呢？我向陈原提出，他一笑置之，照样放行。还有一本岑仲勉先生写的《黄河变迁史》，书里有这么一段话，说黄河怎么变迁的，很多人考察过，都不如我的考证清楚，因为我是根据古今的记载讲的，所以比实际考察准确。我说这有点违反实践论了。陈原说我们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这本书改革开放以后也印了。总之，一时间，开门办社，衣食父母，翻箱倒柜，传播知识，那些口号响彻云霄。那时的中宣部的一位处长、历史学家黎澍同志，推荐我们到上海去找老记者陶菊隐，后来出版了他的《北洋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出版后也有很大影响。

还有一件当年让我很惊异的事。那其间，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胡适，这在知识界震动很大。人民出版社根据上级指示，要出版《胡适批判文集》。这是大事，大家很尽心，先后一共编了八辑。但奇怪的是，到第一本快出的时候，得到通知，出版名义改为“三联”。三联版的书，在政治上是低一头的。从这里，我开始意识到，做出版、干编辑，真不能头脑发热。连批胡适如此大事，上面说得热闹，做起来也讲尺度的。

更重要的，我参与的最多的，就是要编一个十二年的翻译规划，规定十二年出版一亿二千万字外国名著的译本。明确提出的口号是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认为日本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们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外国经典。这据说是胡乔木提出来的。这个规划我参与了。规划印出来是蓝皮的，所以叫“蓝皮书”。我记得出的第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下面一本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是一位北大教授翻译的。这本书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严厉批判了的。出这本书以后领导有点害怕，所以接着又赶紧出了一本《就业利息货币通论批判》。

当时我做这事很有兴趣，因为从这里学了不少编辑的基本功，读了不少书。记得陈原和史枚都要我多读马恩的书，从那里找他们对西方经

典名著的评价。我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后，才知道杜林的书大可一出。

当然，尽管用“三联”名义出书大为放宽尺度，但是有些还是出不了。我记得，大约1955至1956年的某一天，潘光旦先生挟着一大堆稿件亲自来访，社领导都不在，由我这小秘书接待。潘老希望出版他翻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特别是他煞费苦心写的大量注释。我在韬奋图书馆读过霭里斯书的俄文本，似懂非懂，以后读到潘老的译本，特别是他的注释，十分钦佩。那天我同潘老又大讲宝山方言，非常兴奋。我以为出他的译本是没有问题的。不料，领导们最后研究结果，不但不能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连三联书店名义也不可能。那时，还在讨论一位陈达教授关于人口问题的著作，大家很感兴趣，但后来也否决了。领导人对此都很遗憾。我后来估计，他们一定已经听到什么消息，上面要对社会学下手了。

除了组织和审读稿件以外，还学到些什么呢？

那就是如何编辑加工稿件。有一本叫《中国史纲》，张荫麟先生的名著。编辑加工时，删掉了一些话，如说到昭君和番，去和番的美女“未必娇妍”。编辑把“未必娇妍”删了，认为写得庸俗。后来，曾彦修等几位领导认为，这事做得过苛，我们应当允许作者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像张荫麟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学者。诸如此类，都大有异于过去的方式。

至于文字，更主张著者有自己的自由。当年出版总署叶圣陶副署长是主张语言规范化的，后来人们有点误解，以为编辑必须大刀阔斧地为作者“统一”规范。记得有位张蓉初教授，他译的俄国史著作里说某人的病“一日日好起来”，编辑把“一日日”改为“一天天”。领导也认为不必。总之，他们认为，当编辑的，要抓大事，小事不要拘泥。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年从上到下都比较注意张扬“三联”能容纳多种不同意见的个性。

在社领导中间，陈原先生最年轻，名次排在最后。他当然也参与决策，例如多次带组稿团外出，还主持十二年翻译书的规划等等。此外，

他的特别的贡献，就是认认真真地做出版社的管理工作。大家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版工作是不讲正规化的。无论做什么，都喜欢搞“游击作风”。陈原为此大加整顿。例如编辑访问作者，事后必须写详细的访问报告。对书稿的修改，必须有记录。陈原经常表扬一位张梁木先生，他的档案记录写得最多，写得最好。陈原提出建立书稿档案管理制度。还主张编辑工作中很多事要“挪前做”。就是在做选题的时候考虑到约稿，约稿的时候考虑到来稿，来稿的时候考虑到加工。还有一个观念是陈原非常强调的，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就是上面说过的尊重作者的文风。说实话，那时很多年轻人学《语法修辞讲话》学得走火入魔，有人甚至要改鲁迅的文章。例如鲁迅不大用“和平”一词，总说“平和”，有人就主张修改鲁迅的文章，陈原竭力阻止。这问题我觉得现在还有现实意义。要保存作家的风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个三联书店编辑部，实在人才济济。不知道什么原因，上面调了不少高级的政界和知识界的人物进来。在那时的人民出版社里，这个编辑部加上还有一个世界知识编辑部，其中知名人士据我记得就有：

何思源：北京市老市长，没到台湾去，对北京的解放有功。他是很活跃的一个人。山东人，跟我非常熟。我跟他学过法语，他又介绍人教我德语。他很愿意帮助我们年轻人。

刘仁静：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跟毛泽东在一起干过革命，可是他以后参加了托洛茨基派。他专门翻译俄文的东西，中国人中就他见到过托洛茨基。他也跟我谈得来。他在编辑部专门翻译普列汉诺夫的东西，不用来上班。我每个月见他一次，向他拿稿子，同时给他九十块钱。

彭泽湘：1922年的老共产党员，为北京的和平解放出过力。

舒贻上：湖南名流，据说给齐白石算过命，还当过毛泽东的老师。

郭根：《文汇报》的名记者。

还有一位应德田。他是张学良的秘书，也留下来了，他是专门编中国历史书的。

还有董秋水。他也是东北军的，张学良下面的人。也是搞历史学